

民主论四题

林 剑

【内容提要】本文不是阐述民主的一般理论，只是就民主研究中存在的若干观点进行澄清与分辨。本文阐述的几个基本观点是：第一，民主政治并不是政治文明的唯一形式，政治文明的标志是国家，专制政治与民主政治都是政治文明的表现形式。民主价值也不具有普世的性质，民主共和国只是近代以来才具有的一种国家形式。第二，不能抽象地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对民主的价值评价应放在具体历史条件下，放在具体的社会经济结构与阶级结构中去进行。第三，不能以民主既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也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为根据，就推定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以前一切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民主有别于资本主义民主。第四，每一个国家与民族都有权选择自己的政治与治理形式，民主不能被迫与强加，需要各国人民根据自身的发展水平与所处历史阶段作出适当的选择。

【关键词】民主政治 民主的历史性 资本主义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

作者简介：林剑（1957-），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9）。

民主是不是普世的？民主是不是个好东西？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区别在哪里？我们需要怎样的民主？这是当前人们在谈论民主问题时，无法回避的重要话题，也是我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回应与解答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一、民主是历史的，不具有普世价值的性质

在政治学领域中，民主既可以用来指称一种国家政权的政体形式，也可以用来指称国家事务的治理方式。民主政体的对立面是寡头的、专制的政体，民主治理的对立面是垄断的、独裁的专政。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上看，民主代替专制既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对于民主代替专制的这种历史的必然性与进步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仅曾经给予过充分的肯定，同时还对民主制对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意义给予过积极的评价。恩格斯在其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谈到国家发展的历史时，虽然一方面认为“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和依附农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8页。

但另一方面也极其明确地肯定“国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国，在我们现代的社会条件下正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后决定性斗争只能在其中进行到底的国家形式……”^①

从社会历史演进的维度看，民主的国家形式高于专制的国家形式。一般来说，专制的国家形式属于国家发展历史的较低阶段，民主共和国属于国家发展历史的较高阶段，民主的国家形式取代专制的国家形式在国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具有必然性。一切民族国家最后的与最高的国家形式必然是民主共和国的形式，这是国家发展的规律与最后归宿，也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所表达的一个原理性的结论，这个结论的科学性是无须也无可争辩的。但这种无可争辩性是否意味着民主是社会政治文明的唯一形式？是否意味着民主是一种普适性或普世性价值？是否意味着强权国家就有权打着民主的旗号强迫其他民族和国家接受自己的政治制度与治理方式的做法，也具有无可争辩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这是时下国内外都存在激烈争论且分歧巨大的问题，也是马克思的历史观与民主观应予以回答与澄清的问题。

民主政治是政治文明的唯一形式吗？在不少人对政治文明的认知里，的确如此。时下，不少的论文与论著在谈到社会的政治文明时，几乎是普遍性地将政治民主等同于政治文明，认为政治民主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因此政治是否是民主的，就成为衡量一种政治是野蛮的还是文明的尺度与参照坐标。我们虽然同意民主是近代以来的政治文明的核心，也同意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说法，却不能认同民主政治等同于政治文明的说法。其实，从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看，专制政体也好，民主政体也好，都是国家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存在形式与国家职能的实现形式。国家的产生既是社会文明生成的结果，也是文明社会生成的标志，因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②。认同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也应认同专制政治与民主政治都属于政治文明的范畴，因为专制与民主是国家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所表现出来的存在方式与治理方式。人们可以将专制政治视为政治文明的低级阶段，民主政治视为政治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却不能将民主政治等同于政治文明，认为民主政治是政治文明的唯一形式，而将专制政治排除在政治文明的范畴之外。文明是发展的，因而是历史的，政治文明也一样，也是一个历史范畴。一切历史性的东西都是可以进行比较的，可以比较的东西就存在着高与低、先进与落后的区分，但落后的文明也是文明，它们同样构成人类文明史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是，民主共和国与民主政治是在近代历史上才产生或出现的，而国家的历史却要久远许多，承认国家的历史是文明史，而否认专制的历史为政治文明史，在理论的逻辑上恐怕是难以圆融与自洽的。

民主是一种普适或普世价值吗？这是当今国际与国内思想界争论的另一焦点问题。不仅国内外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人将民主作为一种普适或普世价值加以兜售，甚至国内的一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也随声附和。而他们附和民主是普世价值的一个重要理由与根据是，既然资产阶级国家崇尚民主价值，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同样也视民主为一种核心价值，说明追求民主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与民族价值取向的基本趋势与潮流，不就是证明了民主的普世价值性质吗？应该说，自由主义者将民主视作一种普世价值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自由主义的理论逻辑中，人是生而自由与平等的，生而自由与平等的人们应该享有不可剥夺的民主权利，人们的民主权利是人民主权思想的实现形式。然而，对于某些自称持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来说，认同与附和民主是一种普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3页。

世价值的观点则显得很奇怪了。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一切历史现象都不具有普世与永恒的性质。

首先，民主作为人们享有的权利，不是天赋的。所谓天赋人权理论不过是资产阶级思想家为论证资本主义永恒性与为资本主义合理性、合法性进行辩护而制造出来的一种神话与鬼话而已，因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①。

其次，民主政治作为国家政体的存在方式与国家治理的方式，并非存在于国家发展史的全过程中，民主共和国不是国家的全部形式，而是“国家的最高形式”，专制政治的历史比民主政治的历史要长久得多。正如马克思所说，民主政治的历史必然性也不是国家历史一切阶段上的不可避免的必然性，而只是“现代的社会条件下”，确切些说，是在商品经济占支配与统治地位条件下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专制国家与专制政治虽然是国家形式与国家政治发展的较低形式和较低阶段，并且从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看，专制的国家形式与专制政治将被民主的国家形式与民主政治所取代，但这决不意味着专制政治在历史发展中是没有“不可避免的必然性”的。如果说“民主共和国”与民主政治具有商品经济与大工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不可避免的必然性”，那么专制国家与专制政治则有自然经济与手工劳动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因为在以手工工具为主进行劳动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所产生的必然是以贵族为主的等级制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而在等级制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为主的历史条件下，专制政治是必然，民主政治反而是偶然的。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是，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农耕社会中，普遍实行的是专制政治，只有希腊雅典的民主制是一个特例，并且雅典的民主制瓦解之后，再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与国家在农耕社会中复制过雅典式的民主制。

最后，从马克思历史观的视野上看，专制政治也好，民主政治也好，都具有国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不可避免的必然性”，相对于它们存在的历史阶段与历史条件来说，它们都各自有其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与正当性。因此，民主政治虽然是政治文明的最高形式，但不是政治文明的唯一形式，只是商品经济与大工业生产方式对政治发展的要求，而不是一种普适或普世的价值要求，因而民主的价值也具有历史的性质。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对民主的普世价值论的任何意义上的附和，不论其出发点是什么，至少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历史观的误读与背离。

二、民主并非无条件地“是个好东西”

如上所述，由于民主政治是政治文明的一种历史形式，所以对民主政治的价值评价也应是历史性的，而不应是抽象的。所谓历史性的，即是将民主的作用与价值放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与环境，以及它对社会历史的具体作用，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价，而不应抽象地否定与肯定。

前些年，国内曾有一位颇有名气的学者提出了一个颇为有名的命题“民主是个好东西。”^②应该说，这一命题曾获得不少人的认同，时至今日，仍被不少人在论文与著作中加以引用或引证，鲜见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与不同看法。本文不怀疑与否定做出“民主是个好东西”这一结论的作者在价值取向上的积极性，但却对这一观点的科学性与严谨性不敢认同，也对作者的历史观与民主观是否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5页。

^② 参见闫健编《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深受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存疑。

首先,从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与政治文明发展史的维度看,如前所述,专制政治与民主政治都是政治文明在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必然表现形式。既然是一种必然性的表现形式,相对于它们各自存在的社会条件与历史环境来说,各自都有着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专制政治也好,民主政治也好,虽然是可以进行比较的,但这种比较不能诉诸简单的抽象方式,因为它们都具有历史的性质。属于历史性的存在,只有联系具体的社会条件与历史环境,才能做出科学的分析与评价。好与坏属于价值评价,但价值评价不能是任意的主观性评价,不能是你说好它就好,你说坏它就坏,否则就会陷入唯心主义泥潭。价值性评价也有一个科学与否的问题,在社会历史领域,价值评价的科学性是不能脱离社会历史的必然性与规律性而获得确认的。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无疑意味着专制是个坏东西,这样的判断放在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语境中,放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语境中,它无疑是正确的,这不仅在于近代以来反对专制、争取民主成了一种社会潮流,也不仅仅在于,对民主的诉求构成了一切革命阶级与进步力量所争取的价值目标,更为深刻的原因在于它反映了商品经济与大工业发展的必然性的要求。然而,民主是否在任何社会条件与历史环境中都属于好的东西?反之,专制是否在任何社会条件与历史环境中都属于坏的东西呢?包括“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论者在内,可能的确有不少人是抱有这样的认知的,然而这样的认知是没有历史观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既成事实表明,专制政治在农耕社会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与正当性的,这种合理性与正当性在于它是农耕社会固有的社会条件与历史环境下的必然产物,它对农耕文明的生成与发展在总体上是有利的。相反,民主政治在农耕社会中是缺乏生命力的。一个无可争辩的根据是,专制政治在所有的农耕民族与国家中都表现为一种普遍性,而民主制只是在古希腊的雅典才有过极其短暂的存在。在农耕文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反对贵族专制政治的起义与革命虽然并不少见,但取得胜利的革命却不多见,更为重要的是,即使那些革命成功的阶级在取得胜利后所建立的政权依然采取的是专制的政治形式与专制的治理方式。不可否认,雅典的民主制的国家形式是适合雅典当时的社会状况的,也应看到,“使雅典灭亡的并不是民主制”^①。但需要深思的是,雅典的民主制即使是个好东西,那也只是相对雅典当时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社会状况来说才有意义,不然的话,为什么雅典的民主制不仅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农耕文明阶段没有出现被其他民族所仿效的例证,而且雅典的民主制一旦瓦解后,在其后的近两千年的历史跨度中,再也没有出现重新崛起与复活的例证?

其次,民主政治与民主是否具有合理性、正当性,是否是个“好东西”,不仅取决于社会经济结构,同时也取决于社会的阶级结构。民主政治的存在与专制政治的存在一样,都是以国家的存在作为前提的,而国家的存在又是以阶级与阶级矛盾的存在作为前提的;二者的不同在于,统治阶级实现其阶级统治的方式与手段存在着重要区别。民主政治虽然不同于专制政治,它在形式上并不是按各阶级以及不同阶级的个人所占有的财富状况去分配与核定个人享有的权利,而是平等地赋予社会成员表达自己的意愿与利益诉求的权利。然而,由于各种不同原因的制约,不同的民族与国家在经济发展的状况上通常存在差异,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通常会形成不同的阶级结构与社会结构。而在有着不同的阶级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国家中,同样的民主模式往往产生不同的历史效应与价值效应。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还不发达、资产阶级力量还不够强大、农民人口与小资产阶级人口占据优势地位的国家,民主政治不仅不能促进资本主义与社会文明的发展,反而会阻碍资本主义与社会文明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4页。

发展。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一文中，就曾对卡尔·海因岑的有关革命的说教进行批判，指出“农民的独立的民主运动每一次都是反动的。”^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独立的农民运动”为何不仅不具有进步的性质，反而是“反动”的呢？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视野里，农民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生存的基础是手工劳动与小商品生产的生产方式，这种小生产的生产方式与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在发展方向上是相背离的，大工业越发展则意味着小生产的生产方式的日益瓦解与没落，而伴随着小生产的生产方式的瓦解与没落的也必然是农民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破产与利益受损。维持本阶级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不变，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几乎是阶级社会中一切阶级与等级所具有的阶级本能。同样，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在国际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还占优势，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不够强大与巩固，社会主义在发展上还处于初级阶段时，片面地强调“民主是个好东西”，片面地推行一人一票的所谓普选制，也不能说是一个好的口号与好的做法。苏联与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瓦解、政权垮台就是一个令人深思的惨痛教训。不可否认，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际方面的，也有自身方面，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因素，但谁又能说这种剧变和失败与戈尔巴乔夫的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的所谓“新思维”没有关系呢？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盲目地照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模式，不但不能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还有可能导致无产阶级政权的垮台。这不是一个水土不服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民主在性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民主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实行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与进步。

最后，为了不致引起读者对本人所持观点、立场的误读，再次明确地重申一下自己的立场也许是必要的：本人不认同“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命题或口号，并不意味着本人是民主政治的反对者，更不意味着是专制政治的拥护者与辩护者。只是想说明与阐释，专制政治也好、民主政治也好，它们都是政治文明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所表现出的历史必然性，相对于它们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与历史环境来说，都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与正当性。民主政治与民主的好与不好不能诉诸抽象性的评价，不能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的条件与环境。只有它符合社会历史必然性要求，并能推动社会历史进步与文明时，我们才能称之为好；如果它不具备历史必然性，并导致社会的混乱，甚至是阻碍了社会历史进步时，我们就不能称它为“好东西”。

三、民主何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如果说民主政治与民主不是一种普适或普世价值，那么人们又应如何去解释，民主不仅是构成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与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构成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呢？无论是当代发达的民族国家，还是处于发展中的民族国家，为什么都不愿意在民主的问题上放弃或丧失自己的话语权呢？这通常是国内外的持民主普世价值论者向他的反对者与怀疑者所作的惯常追问，也是一些人自以为是地为民主的普世性质作辩护的最充分的根据。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民主观来说，对类似于上述的辩护与追问给予澄清与回答，既是必要的，也是无法回避的。

在当下的时代，民主既被资本主义价值观视为核心价值，也被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视为核心价值。但在这里，必须加以说明的是，“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价值，在内容和性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0页。

上与作为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核心价值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民主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群众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实现的。其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民主是对人民民主和对敌人专政的辩证统一，没有人民民主就不能有效地对敌人实行专政，而没有对敌人的专政也就没有对人民民主的保障。在人民内部，是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新的、最广泛的和最高类型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与社会主义的国家职能联系在一起的，它的发展方向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市场经济从而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最终也消灭民主，向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联合体迈进。而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是对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是以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是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联系在一起的。资产阶级民主也有它的“民主集中制”，它的民主就是让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通过“自由、民主、平等”等形式实现原子化、碎片化，它的集中就是“资本的集中”。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消除了旧时代的贵族、行会师傅等各种特权势力，消灭了人口、生产资料和财产的分散状态，使它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从而使资本成了社会的决定力量。资产阶级不但建立起统一的国内市场，而且奔走于全球各地，不断开拓世界市场，实现资本的全球化。一句话，资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就是丛林法则推行的“弱肉强食”，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最终使整个社会处于极为尖锐的“对抗状态”。所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②可见，民主同样存在着姓资姓社的问题，当它们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结合时，它们就是社会主义的；反之，当它们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结合时，它们就是资本主义的。如今，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也是市场经济，但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并不相同，因而阶级内容也不同。我们不是一般地、抽象地讲市场经济，而是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所倡导的民主与资本主义的民主也必然有着本质的不同。

对民主的认知，不少人通常只是从表象与形式上去进行把握与认知，片面地认为，民主的要义在于个人是否具有自由地、平等地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有人甚至将是否实行一人一票的普选制视为评判政治是否民主的唯一标准。然而，如同市场经济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分一样，民主也存在着资产阶级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之分。民主政治作为政治文明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具有历史性，也具有阶级性，不同社会制度与社会经济基础上的民主具有不可争辩的性质或本质上的区别与差异。深刻的原因在于，任何类型的政治无不必然要受到社会经济基础的约束与规范，同时也是为一定经济基础服务的。资产阶级民主反映与表达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并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社会主义民主也必然要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并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私有资本是一种“普照的光”，这种资本不仅是构成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石，同时作为一种“普照的光”，也使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一切受这样“普照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的光”的照耀，并使之染上资本的色彩。资本主义的民主必然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只要民主是在资本的陀螺上跳舞，它就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的性质。因为民主是受法制规范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与法律在保护着资本不受侵犯的同时，也保障着民主不能挣脱资本的掌控。一人一票的所谓普选制，虽然可以导致国家领导人与执政党的更替与轮换，可以使某些具体的政策具有所谓的左翼或右翼的色彩，甚至可能产生一些带有社会主义因素与色彩的政策，但从没有过无产阶级通过普选制使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与政治统治得以颠覆、并使自己摆脱受资本奴役的经验性例证。如果资本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居于统治地位，不论政府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政府的政策中含有多少社会主义因素，都不会改变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

社会主义民主之所以与资产阶级民主有本质的不同，根本性的原因在于社会主义民主是以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基础的民主。这种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民主，无论是从理论的维度上看，还是从历史的维度上看，都应优于与高于资产阶级民主。从理论的维度看，社会主义民主能够摆脱资本对民意的控制与操弄，使民主易于趋向理性与符合社会历史必然性以及合理性、现实性要求，也更能表达社会大多数人对利益的诉求；从历史的维度看，社会主义民主代表着民主发展的未来方向，它是民主发展的趋势与必然。诚然，从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历史方面看，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走过不少弯路，遭受过不少挫折，在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现实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然而我们也要看到，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历史远比资本主义的历史短得多，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社会经济水平还处于向现代化发展的阶段，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必然要推动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与进步。如果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的话，我们也应有理由相信社会主义必将创造出一种优于与高于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同样，我们或许可以更有信心地猜测：再过五十年（也许需要更长一点的时间），在民主的发展上，美国与欧洲需要追赶中国，因为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自由与民主，不可能是真正的自由，也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

总之，理解社会主义民主必须从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去理解，从其阶级内容去理解。“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既是在上层建筑领域更好地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需要，更好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需要，也是在经济基础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四、任何国家都无权将自己的制度强加于人

在有关民主政治与民主的问题上，还有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观点，即标榜自由民主的民族与国家是否有权将自己的自由民主理念与民主制度或模式向其他民族与国家进行输出与推广？是否有以推广民主的名义，并不惜以诉诸武力的方式强行地要求其他民族与国家接受自己的政治制度的权利？这些问题不仅是当前国际政治领域中人们经常需要直面的问题，也是国际意识形态领域中经常引起纷争与冲突的焦点问题。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与冷战结束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借推广自由民主之名，行干涉与颠覆别国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权之实，几乎成为它们推行强权的一种惯常性的做法。以美国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2页。

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对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进行百般丑化与攻击，对广大的发展中的民族与国家大搞和平演变和所谓的“颜色革命”；更有甚者，他们还公然在推广民主与反恐的名义下，悍然发动了对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的战争，使一些不服从西方强权的政权一个接着一个地瓦解与被推翻。强权国家是否有权将自己认同的自由民主的理念与价值、政治制度与治理模式强加给其他民族与国家呢？在自由主义理论的视野里，这样的追问纯属多余。因为在他们的理论认知中，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以及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是唯一合理的与无法取代的制度，具有无可争辩的普世性质。这是自洛克以后，几乎所有的自由主义者一再重申的基本观点，也是福山在名噪一时的名著《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再一次重申的基本观点。既然自由民主是一种终极的政治形式，具有普世的历史性，那么推广自由民主的理念与价值，帮助落后的民族建立自由的民主制度，不仅是发达国家享有的一种合法权利，同时也是他们应当承担的一种历史责任与历史使命，这即是强权国家输出自由民主的理念与民主制度的基本逻辑。然而，这样的逻辑纯属一种强权的诡辩。

任何国家，不论它自认为自己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有多么先进、多么优越，也不论其他国家在它看来在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上多么落后与多么讨厌，它都无权向别的国家输出自己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更不能以“普世价值”的名义强迫其他国家照搬、复制自己国家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每一个民族与国家都拥有根据自己国家发展的实际状况和自己人民的实际意愿选择自己国家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权利，这应是一种无可争辩的权利，即使根据自由主义的理论原则，这种权利也拥有不可争辩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因为，在自由主义的理论逻辑中，自由是自由主义理论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石，是自由主义理论原则中的第一原则。自由主义政治学说中所宣称的人民主权原则，以及以这一原则为理论基础衍生出来的民主的原则，都不过是从自由原则引申出来的派生性原则。强权国家向其他国家强制性地推行自己的民主制度时，也许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自由，他们享有这种自由的权利。然而，他们是否想过也应该赋予被强制对象具有与自己同等地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的自由权利？如果只赋予自己自由权利，无视与否定其他国家的人民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的自由权利，这是否会使自己的理论陷于一种双重标准的强权逻辑的嫌疑与困境之中？每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不是平等地享有选择社会制度的权利，自由的“普世价值”何在？如果自由的价值是普世性的，强权国家的强权的根据又何在呢？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这也许是一个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的理论困境。

当然，一个民族与国家究竟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及是否有权选择自己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并不是由某种理论决定的，更不是依凭某种理论原则核准的，而是由各个具体的民族与国家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和现实的社会发展状况决定的。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究竟采取的是民主的政治制度，还是非民主的政治制度，虽然与一个国家的人民的选择不无关系（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完全违背人民利益与意愿的社会制度，包括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是不可能长久地持续下去的），但人民的选择也并不是随心所欲的，通常的情况下要受到该民族与国家社会发展状况的制约。就政治制度的选择而言，政治制度属于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而政治上层建筑的性质与模式，以及它的发展与演进、转型与更替既要受到社会经济基础的约束，同时也要受到社会的文化传统与文化观念的制约，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社会生产关系的制约。归根到底，一个民族与国家在政治制度上究竟采取的民主的政治制度还是所谓非民主的专制性的政治制度，是由该民族与国家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性质决定的。

总之，每一个民族与国家的人民有权根据自己的民族与国家的社会发展状况（下转第134页）

俄国人的路”，选择了崇高的共产主义价值理想。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进程中，毛泽东在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道路的影响下，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不仅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诞生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十月革命所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不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也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实现了第二次理论飞跃，诞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伟大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形成了治国理政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念新战略，正在引领中国人民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 [1] 《侯惠勤自选集》，北京：学习出版社，2012年。
- [2] 靳辉明 《社会主义历史、理论与现实》，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
- [3] 王东 《辩证法科学体系的列宁构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 [4] 赵耀等主编 《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
- [5] 《孙伯鍔哲学文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编辑：汪世锦)

(上接第96页) 与发展阶段，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与政治制度，因为一种政治制度是否是合适的和合理的，本民族与国家人民无疑比他人更清楚与更有发言权。民主不能是外部输入的，更不能是强加的。正如世界上不存在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民主的实现形式也不可避免地会呈现出多样性与差别化的特征。例如，小国可以实行直接性的民主，大国则可以实行代议制民主；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实行票决式民主，即多数专制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中国则在实行票选民主的同时，又创造出了协商式的民主形式。是直接式民主好？还是代议制民主好？是票决式民主好？还是兼有协商式民主好？还是要看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在资本的基础上不可能实行协商式民主，只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行协商式的民主形式。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复制发达国家的民主形式，社会主义民主不可能复制资本主义民主形式，资本主义民主也不可能模仿社会主义民主形式。因此，一切民族与国家既无权，也不应当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强加在别国身上。

总之，民主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特别是在政治实践活动中生成的，并且会随着社会经济基础及其政治实践活动的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相对于资产阶级民主而言，是一种更为先进的民主，也是一种更符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方向与现实的民主。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参考文献:

- [1] 〔美〕弗朗西斯·福山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商华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 [2] 〔美〕罗伯特·A. 达尔 《民主及其批评者》，曹海军、佟德志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 [3] 〔美〕乔万尼·萨托利 《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 [4] 闫健编 《让民主造福中国：俞可平访谈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

(编辑：谭晓军)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o treat it as a systematic project ,with the help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as well as legal and policy support.

Four Themes on Democracy

Lin Jian

This article is not to elaborate the general theory of democracy ,but rather a clarification and explication of a few points in relation to the studies on democracy. First ,politics of democracy is not the only form of political civilization. The symbol of political civilization is the state ,and autocratic politics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are both manifestations of political civilization. The value of democracy is not a universal one ,and democratic republic a state form that only emerged in modern times. Second ,we cannot say that “democracy is a good thing” in an abstract way. The evaluation of democracy should be placed under specific historical conditions ,socio-economic structure and class structure. Third ,we cannot conclude that democracy is a universal value on the basis that democracy is the core value of both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Given that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all previous commodity economies and market economies ,democracy under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s also different from that under capitalist economy. Fourth ,every country and nation has the right to choose their own forms of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and democracy shall never be a forced or imposed one ,but rather be the choice of each country and nation according to the level and stage of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Important Legacy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and the Successful Exploration of the Chinese Path

Jin Minqing

The road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is the road of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with Marxism as the guide of action ,communism as the objective of struggle ,the proletariat and broad masses as the basis and the proletarian party as the leading core. Not long after the October Revolution ,the vanguard figures in China decided to follow the road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The New Democracy an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were all creative adhe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oad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Since the middle of 1950s ,the Soviet Union gradually betrayed the principles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with the nature of the Party and state gradually changed ,which finally led to the collapse of its system and dissolution of the state. Under the constantly changing global situation and the serious setbacks of world socialist movemen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d the Chinese people to continue to inherit and develop the experience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in a creative manner ,and ,based on the specific national conditions of China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has successively created and continuously widened the road of socialism road ,leading China to become ever more prosperous and strong.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f Governance

Yan Shuqun and Zhang Fan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made a series of important speeches ,and put forward the new idea ,new thoughts and new strategies of governance ,which form a scientific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internal coherence and strict logic ,thus opening up a new stage i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s a scientific theoretical system ,Xi Jinping’s thought of governance has a logical starting point ,i.e. ,the governance of the state. State governance is the generaliz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today ,which contains the basic contradiction that runs through the whole theoretical system ,manifests its fundamental features ,embodies the unification of logic and history ,and is in line with the actual content of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governance. The study of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such thoughts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is scientific theoretical system.